

新交易经济学：从交易成本到交易生态的范式革命

赵恢林¹

(1. 汕头大学, 广东汕头, 515063)

摘要：自亚当·斯密开启交易理论研究以来，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旧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八大流派循着各自脉络独立发展，在局部领域实现理论突破，却始终陷入视角割裂、范式碎片化的困境，未能形成统摄全局的核心元范畴与统一理论框架。科斯以交易成本为核心建构新制度经济学，推动现代交易理论实现关键性跃迁，但其单一成本分析维度难以涵盖多层次经济结构，更无法适配数字经济背景下平台交易、数据要素、算法缔约等新型交易形态。本文原创提出“交易生态”核心元范畴，界定其本体内涵与基础公理，搭建微观—中观—宏观—数字全域四维嵌套结构，构建超越交易成本的生态摩擦理论、三层协同治理机制与闭环演化路径，通过范式对比彰显理论原创性与现实解释力。研究实现交易经济学从碎片化分项研究向系统性范式的根本性变革，既兼容整合西方各流派合理内核，又能破解传统理论无法解释的数字交易新现实，为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建构、市场制度设计、平台生态治理及全球交易秩序重构提供奠基性原创理论支撑。

关键词：交易生态；新交易经济学；生态摩擦；制度演化；数字交易

一、导论：交易理论的流派分野与范式革命的时代诉求

交易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原生内核与核心纽带，贯穿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全链条，是支撑社会经济循环有序运行的底层逻辑。从本质上看，生产的核心目标是创造可供交易的标的物、积累可通过交易实现的价值，分配是对交易形成的利益格局进行再调整，消费则是交易价值的最终兑现与市场反馈，整个

¹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深度转型时期公共风险的经济影响：理论框架、测度方法和实证研究”（23YGC790197）。

作者简介：赵恢林（1992—），男，湖北黄石人，博士，汕头大学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量子经济学；通讯邮箱：E-mail: hlzhao@stu.edu.cn。

经济系统的运转始终围绕交易展开、依托交易维系、归于交易结果。凭借这种贯穿微观个体行为、中观组织运行与宏观制度结构的本源属性，交易自古典经济学发轫之日起，便成为各经济学流派无法绕开的核心议题，成为解读经济运行规律、破解经济发展难题的关键切入点。

历经数百年学术积淀与理论演进，交易理论逐步演化出脉络清晰、各具特色的八大主流流派（何全胜，2026），形成多元并存、相互补充的发展格局，但各流派始终未能突破“各成体系、彼此隔绝、视角割裂”的局限，未能构建起统摄全局、贯通多层的统一理论框架。这种碎片化态势，不仅制约了交易理论的进一步深化，更埋下了范式革命的必然伏笔。八大流派循着各自学术逻辑独立演进，在特定领域实现突破性进展，却共同陷入同质化发展困局，核心症结在于缺乏可统领全域的核心元范畴。

八大主流交易理论流派循着各自的学术逻辑独立演进，在特定研究领域实现了突破性进展，却共同陷入了同质化的发展困局，核心症结在于缺乏一个可统领全域的核心元范畴。古典经济学以人性禀赋为逻辑起点，将互通有无、物物交换视为人的自然本能，明确了交易作为社会分工深化与国民财富增长的基础前提，主张自由交易、反对人为干预与贸易壁垒，奠定了交易理论的思想根基（Smith, 1776），却始终停留在经验观察与现象归纳层面，将复杂的人际权利互动简化为单纯的物品交换，抽离了交易背后的利益冲突、制度约束与社会属性，未能完成交易理论的严谨抽象与体系化建构。新古典经济学突破古典经济学的经验主义局限，依托完全理性、完全信息、零交易摩擦的理想化假设，引入边际效用与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将交易纳入标准化数理框架，完成了交易研究的数理化与体系化升级，确立了主流交易理论的分析框架，却因真空化假设阉割了现实经济的复杂性，刻意回避企业存在、契约不完备、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行为等真实经济命题，仅能解释抽象理想市场中的价格匹配行为，无法回应真实世界的组织形态与制度安排逻辑。旧制度经济学率先打破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想化桎梏，康芒斯（Commons, 1934）做出开创性贡献，将交易确立为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单元，摒弃商品、劳动、效用等传统研究基点，将交易划分

为买卖交易、管理交易、限额交易三大类型，首次将交易从单纯的物品交换升维为人与人之间权利、责任与利益的社会法律关系，却未能凝练出可推演、可建模、可统摄全局的核心元概念，始终停留在范畴界定与现象描述层面。新制度经济学以科斯（Coase, 1937）交易成本范畴为核心支点，实现了交易理论的关键性范式跃迁，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85）引入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不确定性三大维度，构建交易属性与契约治理的匹配逻辑，诺斯（North, 1981）将交易成本延伸至宏观制度变迁层面，阐释制度优化降低交易摩擦、驱动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却因过度倚重单一成本逻辑，无法适配复杂交易形态。此外，公共选择理论（Buchanan&Tullock, 1962）将交易分析延伸至政治领域，不完全契约理论（Grossman&Hart, 1986; Hart, 1995）破解完全契约假设缺陷，行为经济学（Simon, 1947）修正完全理性教条，演化经济学刻画交易秩序自发演化规律（Hayek, 1980），均存在明显视角局限，最终导致各流派局部突破充分、整体统摄不足，始终缺乏一个能统领全域、贯通微观、中观、宏观层面的本原核心概念。本文也不同于王振营 2016 年的《交易经济学原理》以交易主体为逻辑起点，以人类有限理性为基础，旨在考察交易主体之间相互作用如何推动经济系统运行，未充分覆盖数字经济新场景。

数字经济的深度跃迁推动交易形态发生根本性变革，传统交易理论的解释力危机日益凸显，催生了交易经济学范式革命的时代诉求。当前，全球经济正经历从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的深刻转型，交易领域呈现一系列全新特征：平台主导的交易格局逐步形成，重构了传统交易的组织形态；数据成为核心交易要素，打破了传统交易标的物的物理边界；算法替代人工成为交易匹配的核心机制，大幅提升交易效率的同时也带来新的治理难题；跨境数字合约打破了传统交易的时空限制，推动交易向全域化延伸；生态型垄断重塑市场竞争秩序，各类新型交易形态层出不穷、迭代加速。

面对这些前所未有的变革，传统八大流派的理论假设与分析框架普遍失效，难以回应数字时代的交易新现实、破解新难题，其解释力与适用性遭遇系统性危机。本文跳出西方既有理论桎梏，原创提出以“交易生态”为唯一核心

元范畴的全新理论体系，复刻科斯以单一核心概念开创独立学派的学术路径，从零建构本体自洽、结构完整、推演严密、引领全球的交易生态理论范式，破解传统交易理论的碎片化困境，实现交易经济学数百年发展以来的根本性范式革命，为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建构、市场制度设计、平台生态治理及全球交易秩序重构提供坚实的原创理论支撑。

新交易经济学实现了交易理论的范式级原创革新。其一，核心范畴革新，摒弃交易成本、主体互动等传统逻辑，原创以交易生态为元范畴、生态摩擦为核心分析工具，突破西方制度经济学理论桎梏。其二，底层逻辑革新，跳出物品交换与权利让渡的狭隘定义，将交易视作多维度协同共生的生态运行过程，打通微观、中观、宏观理论壁垒。其三，时代场景革新，原生适配数字经济、平台垄断、算法合约与 AI 劳动等新型经济形态。其四，理论价值革新，摆脱对主流经济学的修补式改良，构建独立自洽的理论体系，为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建构提供全新底层框架。

二、交易生态的本体界定、基础公理与范式差异

新交易经济学（New Transaction Economics），是以“交易生态”为唯一元范畴、以生态摩擦为核心分析工具，系统重构交易本质、交易结构与交易演化规律的原创性经济学范式。它将交易界定为主体—资源—规则—技术—环境相互耦合的生态化联结过程，而非单纯的物品交换或权利让渡；以生态完整性、生态适配性、生态稳定性为基准，统一解释微观交易行为、中观组织形态与宏观制度变迁，并特别适配数字经济、平台生态与 AI 驱动下的新型交易形态，为构建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底层框架。

（一）交易生态的本体定义

交易生态是指在稀缺性与不确定性双重先天约束下，由多元交易主体、多层交易关系、多元交易契约、内生交易规则、迭代交易技术、嵌套交易场域六大核心要素，通过相互耦合、关联互动、自组织自适应、动态迭代演化，所形成的具备整体性、生命性、嵌套性、自稳态性、可重构性的有机经济生命系

统。

这一本体定义彻底跳出了传统所有学派的认知桎梏，不再将交易窄化为个体单次的交换行为、单纯的权利转移关系、单一的成本比较标的、局部的契约约定条款、个体的理性决策过程或是无内核的自发演化现象，而是直接将交易升维为自成体系、自我运行、自我演化、自我修复的完整生命系统。从本质上看，一切市场运行、企业组织、产业分工、制度变迁、平台垄断、数字交易秩序，其核心都是交易生态的生成、耦合、失衡、调适与重构的过程。这一定义为统摄所有交易现象、破解交易理论的碎片化困境，提供了最高元范畴与逻辑原点。本文首次将交易从“行为/关系”升维为有机整体生态，确立“生态先于交易、结构决定效率、共生创造价值”的底层逻辑，终结交易理论无统一本原概念的历史。

（二）交易生态的五大基础公理

为保障交易生态理论体系的严谨性、公理化与可推演性，本文确立五条不可突破的底层基础公理，构成整个交易生态范式的逻辑地基，为后续所有理论命题的推演提供坚实支撑。

其一，生态整体性公理。任何单次交易、单个契约、单个企业组织都无法孤立解读，局部交易行为与组织选择，始终由其所属交易生态的整体结构、要素配比与运行规则所决定。脱离生态整体的局部分析，必然陷入片面化与表象化误区，无法把握交易的本质规律。

其二，内生不确定性公理。交易生态天然内嵌认知不确定、未来履约不确定、主体关系不确定、规则适配不确定四大维度，完全信息、完全契约、零摩擦交易仅存在于理论假想之中，永远无法在现实交易生态中内生实现。不确定性是交易生态的先天属性与常态特征，也是所有交易决策与治理安排的逻辑起点。

其三，有限理性内生嵌入公理。交易主体天然具备有限理性、有限自利双重禀赋，同时兼具互惠利他、声誉约束与机会主义倾向。这一人性特质是交易生态与生俱来的初始条件，无需外生强加任何理想化假设，完全贴合现实经济

人的真实行为逻辑与决策特征，构成交易生态运行的微观基础。

其四，生态嵌套分层公理。交易生态天然呈现微观个体交易生态、中观组织交易生态、宏观制度交易生态、数字全域交易生态四层嵌套结构。各层级既自成体系、独立运行，又相互传导、相互约束、相互塑造，形成“上层规制下层、下层倒逼上层”的闭环嵌套逻辑，共同构成完整的交易生态系统。

其五，自组织与可规制共生公理。交易生态具备天然的自组织与自发演化能力，能够依托主体互动、习俗惯例、市场选择自发形成交易秩序；同时，交易生态并非完全放任自流，能够通过制度设计、规则供给、技术赋能、政策引导实现人为调适与结构重构。自发秩序与建构秩序共生共存、协同演进，共同推动交易生态优化升级。

上述五条公理相互支撑、逻辑闭环，后续的结构分层、生态摩擦、治理机制、演化路径等所有理论命题，均可由这五大公理严谨推演而出，确保了整个交易生态范式的内在自洽性。

（三）交易生态与主流学派的范式分野

交易生态范式与传统八大流派之间，并非简单的观点补充或局部延伸，而是底层范式的层级超越与系统重构，二者在核心逻辑、分析视角与理论格局上存在本质差异（见表1）。

与古典经济学相比，古典经济学将交易归因于人类外在的人性本能，研究停留于行为表象；交易生态范式直指交易的内在系统本体，将人性禀赋仅视为生态主体的基础特质，实现了从“表象描述”到“本质解构”的升维。

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新古典经济学坚守完全信息、零摩擦、静态均衡的真空假设，割裂了现实交易的复杂关联；交易生态范式以不确定性、有限理性、内生摩擦为先天预设，直面真实交易的嵌套性、动态性与复杂性，拒绝任何理想化架空，实现了从“理想假设”到“现实适配”的转变。

与康芒斯旧制度经济学相比，康芒斯仅完成了经济学最小分析单元的范畴调整，未能形成体系化推演能力；交易生态范式实现了范式层级重构，以生态系统为核心，统摄所有交易单元、组织形态、制度规则与社会秩序，理论格局

与解释维度全面跃升。

与科斯新制度经济学相比，科斯以单一交易成本为逻辑支点，将所有经济选择化约为成本大小的比较，属于单点维度的理论突破；交易生态范式以系统生态为核心支点，交易成本、管理成本、契约成本等均内生于生态结构之中，仅是生态运行的衍生变量，实现了从“单点成本逻辑”到“系统生态逻辑”的层级超越。

与公共选择理论相比，政治交易仅为交易生态在公共政治场域的一个子生态分支；交易生态范式打破领域壁垒，将市场交易、企业内部管理交易、公共政治交易、社会非正式人情交易、数字平台交易等全部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实现了交易理论的通用化与通论化。

与不完全契约理论相比，契约仅是交易生态内部的中间耦合机制，契约的不完备并非外生给定，而是生态不确定性、资产专用性、主体有限理性等因素共同作用的内生结果；交易生态范式从本源层面解释契约形态、履约困境与剩余权利配置，彻底突破了“就契约论契约”的局部局限。

与行为经济学相比，有限理性只是交易生态微观主体层的先天禀赋特征，是生态运行的初始约束条件；交易生态范式将个体行为置于中观组织、宏观制度、数字全域的嵌套框架中解读，避免了孤立化、碎片化的行为分析，实现了微观行为与宏观秩序的有机统一。

与演化经济学相比，演化学派仅侧重交易秩序的过程现象描述，缺少核心内核与内在机理；交易生态范式明确了演化的内在结构、内生摩擦、治理逻辑与阶段路径，将无序的现象演化转变为可推演、可规制、可设计、可预判的理论体系，实现了从“现象归纳”到“理论建构”的升维。

表 1：交易生态与主流学派的范式分野

理论流派	核心研究视角	核心理论贡献	固有理论局限	交易生态范式的超越与整合价值
------	--------	--------	--------	----------------

理论流派	核心研究视角	核心理论贡献	固有理论局限	交易生态范式的超越与整合价值
古典经济学	人性交换倾向、自由交易与分工关联	奠定交易理论思想源头，确立交易对财富增长的基础作用	假设交易无摩擦、无制度约束，将交易简化为人际物物交换	纳入生态整体框架，将交换倾向作为主体禀赋子集，兼顾自由交易与制度约束、多重交易摩擦
新古典经济学	完全理性、一般均衡、价格匹配交易	实现交易研究数理化、均衡化，构建主流价格交易模型	理想化真空假设，脱离制度、组织、契约与行为现实	摒弃完全信息零摩擦假设，以有限理性与内生不确定性为基础，兼容均衡逻辑又超越静态均衡局限
旧制度经济学	交易作为基本分析单元、三类交易划分	重构经济学研究基点，引入制度与社会法律关系	仅完成范畴界定，无系统范式与推演体系	以交易生态统摄三类交易，从分析单元升维为系统范式，搭建完整推演体系
新制度经济学	交易成本、企业边界、制度变迁	开创交易成本范式，重塑企业、市场与制度认知	单一成本维度，难以适配复杂生态与数字交易	将交易成本内化为生态摩擦子集，从单点成本逻辑升维为系统生态稳态逻辑
公共选择理论	政治交易、投票寻租、委托代理	拓展交易范式至公共治理领域	局限于政治单一场域，无通用交易元理论	将政治交易纳入宏观制度子生态，实现市场与政治交易统一范式解读
不完全契约理论	剩余控制权、契约不完备与治理	破解完全契约假设缺陷，解释组织与合约逻辑	局限于契约局部环节，脱离整体生态约束	从生态不确定性本源解释契约不完备，将契约纳入生态耦合机制整体框架

理论流派	核心研究视角	核心理论贡献	固有理论局限	交易生态范式的超越与整合价值
行为与实验经济学	有限理性、认知偏差、信任互惠	修正完全理性假设，还原真实交易人性	仅聚焦微观个体行为分析，缺乏中观宏观统摄	将有限理性作为生态主体基础禀赋，嵌入四层嵌套结构实现全域解读
演化经济学	自发秩序、系统演化、网络关联	摒弃静态均衡，刻画交易长期演化规律	无核心元范畴，偏重现象描述缺少内在机理	以交易生态为核心内核，赋予演化明确结构、摩擦机理与治理路径，实现从现象到理论的升维
交易生态新范式	交易生态系统、四维嵌套、生态摩擦、协同治理	原创元范畴，建构大一统交易经济学范式，适配传统与数字交易	需后续数理建模与实证拓展	统摄所有流派合理内核，突破各学派固有局限，解释传统理论无法覆盖的数字交易新形态，具备全球范式引领价值

三、交易生态的四维嵌套结构体系

依托生态嵌套分层公理，本文建构“微观个体交易生态、中观组织交易生态、宏观制度交易生态、数字全域交易生态”四层嵌套结构体系，将八大主流学派的全部研究范畴完整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实现了传统交易理论的兼容整合、逻辑升维与边界拓展。这四层结构层层嵌套、上下传导、互构共生，共同构成交易生态范式的主体骨架，清晰呈现了交易生态的层级结构与运行逻辑。

（一）微观个体交易生态

微观个体交易生态是整个交易生态系统的基础细胞与原生载体，核心构成包括：自然人与小微个体等交易主体，熟人之间的非正式交易关系，基于默契与信任的口头约定、隐性契约，习俗惯例与乡土潜规则，个体基于经验积累形

成的交易技能，以及线下熟人圈层、邻里集市等传统交易场域。

这一层级的交易活动，主要覆盖了古典经济学关注的自然交换行为、行为经济学研究的个体决策偏差、实验经济学分析的双边匹配与议价交易，以及乡土社会中人情化的非正式交易。其核心运行特征表现为自发生成、关系本位主导、人际信任支撑、规则柔性化，交易稳定主要依托长期声誉互动与重复博弈维系，交易逻辑偏重人情纽带与情感联结，正式制度与书面契约的约束作用相对弱化。作为所有高层级交易生态的源头根基，微观个体交易生态中形成的个体交易习惯、信任模式与行为禀赋，直接塑造了中观组织交易生态的运行底色与发展走向。

（二）中观组织交易生态

中观组织交易生态是交易生态系统的骨干载体与核心枢纽，涵盖企业内部生态、产业链供应链协同生态、行业协会自律生态、中介服务机构生态、平台商户共生生态五大子系统，是连接微观个体与宏观制度交易生态的关键中间层级，承担着交易传导、摩擦缓冲、秩序协调的核心功能。

这一层级完整囊括了科斯（Coase, 1937）的企业边界理论、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85）的契约治理与资产专用性理论、不完全契约与公司治理理论（Hart, 1995）、产业组织与纵向一体化理论等核心内容。其核心特征体现为：组织内部管理交易与组织之间市场交易双向耦合、相互影响；资产专用性与交易不确定性凸显，成为影响交易效率的核心因素；正式契约与关系契约协同治理，共同保障交易有序开展；交易成本与内部管理成本实现动态均衡，成为组织边界调整的核心依据；产业链上下游的权利配置与风险共担，成为中观交易生态运行的核心命题。中观组织交易生态既受微观个体行为禀赋的底层制约，又必须适配宏观制度规则的顶层约束，是整个交易生态系统运行效率的核心承载层。

（三）宏观制度交易生态

宏观制度交易生态是交易生态系统的顶层规则架构与秩序保障，核心构成包括产权界定制度、法治履约规则、社会信用体系、政府市场规制、财税分配

交易、公共选择政治交易、跨区域交易规则等要素，为微观个体与中观组织交易生态划定了权利边界、行为底线与运行框架，决定了整个交易生态系统的运行底色。

这一层级对应着诺斯（North, 1981）的制度变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寻租与投票交易（Buchanan&Tullock, 1962）、康芒斯（Commons, 1934）的限额交易、政府规制与市场边界理论等研究领域。其核心特征表现为：制度供给直接决定全域交易生态的运行效率，产权界定的清晰程度直接影响交易成本的高低；法治体系与社会信用体系相互配合，有效消解信息不对称与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交易摩擦；公共政治交易嵌入全域市场生态之中，深刻影响资源配置效率与交易公平；制度变迁的本质，就是交易生态顶层规则的重构与适配，是应对生态摩擦、实现生态稳态的重要手段。宏观制度交易生态具备强制约束力，能够自上而下规范中观组织与微观个体的交易行为，化解生态内部的利益冲突与秩序失范，保障整个交易生态系统的有序运行。

（四）数字全域交易生态

数字全域交易生态是数字经济时代衍生的全新最高层级生态，也是传统八大学派完全无法适配、唯有交易生态范式能够系统解读的新型交易结构。其核心构成包括平台运营主体、算法智能匹配系统、数据要素交易标的、数字智能契约、虚拟网络交易场域、跨境数字交易规则、数字监管治理体系等全新要素，是数字经济时代交易生态系统的核心引领者。

这一层级直面数字经济时代的全新交易命题，包括平台垄断、算法歧视、数据产权界定、数字合约履约、网络外部性、跨境数字贸易壁垒、虚拟资产交易秩序等，彻底突破了传统交易的时空限制、媒介限制与组织边界限制。其核心特征体现为：数字技术彻底重塑交易边界，打破了传统交易的地域与时间壁垒；算法替代人工成为交易匹配的核心机制，大幅提升交易效率；数据跃升为核心生产要素与交易标的，重构了交易价值创造逻辑；生态网络效应极强且跨界嵌套无边界，形成了多元协同的交易格局；自发演化速度远超传统实体交易生态，同时更容易滋生垄断壁垒、信息茧房与生态失衡等问题。更为重要的

是，数字全域交易生态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反向渗透、重构微观、中观、宏观三层传统生态，推动整个交易体系的结构迭代与规则重塑，成为现代交易生态演化的核心驱动力。

四、交易生态摩擦理论：超越交易成本的系统框架

科斯（Coase, 1937）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成本为唯一分析支点，将所有交易阻滞、组织选择与制度需求均化约为成本最小化问题。这一分析框架虽实现交易理论的重大突破，但单一成本维度无法覆盖现实交易的多重阻滞与秩序失衡，难以回应当代数字经济时代的复杂交易现实。本文依托交易生态整体范式，原创建构“交易生态摩擦”理论，将传统交易成本内化为生态摩擦的一个子类别，建立起维度更完整、逻辑更系统、解释力更强的全新摩擦分析框架，实现对交易成本理论的范式超越与学术拓展。

（一）交易生态摩擦的核心内涵

交易生态摩擦，是指交易生态内部六大要素、四大嵌套层级、多元交易主体之间，因禀赋差异、信息壁垒、规则残缺、契约不完备、利益冲突、技术错配、层级割裂等多重因素，引发的交易行为阻滞、资源配置效率损耗、利益分配失衡、运行秩序失范与生态稳态偏离的总和。

需明确的是，生态摩擦并非交易生态的“异常现象”，而是其与生俱来的常态属性，零摩擦仅为理论假想。交易生态运行与演化的本质，是一个持续消解摩擦、收敛稳态、遭遇新摩擦、再调适重构的循环过程，摩擦的产生与消解，正是推动交易生态迭代升级的核心动力。

（二）交易生态摩擦的六大类型

结合交易生态的结构特征与运行逻辑，本文将交易生态摩擦划分为六大类型，既完整覆盖传统交易理论的核心研究内容，又拓展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摩擦形态，实现从单一成本维度向系统生态维度的根本性拓展，弥补传统交易理论的时代短板。

（1）主体禀赋摩擦。源于交易主体之间的有限理性认知差异、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信任禀赋缺失、公平感知分歧与行为决策偏差，对应西蒙（Simon, 1947）有限理性理论所刻画的人性特质冲突，是微观层面最基础、最普遍的摩擦来源，直接影响微观交易行为的效率与公平性。

（2）信息生态摩擦。涵盖传统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及数字经济时代特有的信息垄断封闭、行业数据壁垒、算法不透明遮蔽、数字信息茧房等新型形态，既覆盖传统交易的信息阻滞痛点，又精准适配数字时代数据独占与算法歧视带来的新型摩擦，是影响交易效率的核心摩擦类型之一。

（3）契约结构摩擦。由不完全契约的先天局限（Grossman&Hart, 1986）、关系契约的履约约束、剩余控制权争夺、长期合作合约的权责模糊等因素引发，囊括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全部核心研究范畴，同时将研究边界拓展至非正式默契契约的履约摩擦，实现对契约相关摩擦的全面覆盖，突破传统契约理论的分析局限。

（4）规则制度摩擦。涵盖产权界定模糊、法治履约体系缺失、政府规制过度或规制缺位、寻租壁垒、跨区域制度规则不兼容等问题，对接诺斯（North, 1981）制度变迁理论与布坎南等（Buchanan&Tullock, 1962）公共选择寻租理论的核心逻辑，主要产生于宏观制度交易生态层面，深刻影响全域交易生态的运行效率与秩序。

（5）组织边界摩擦。主要体现为企业与市场的替代边界模糊（Coase, 1937）、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阻滞、行业垄断壁垒、组织内部管理交易与外部市场交易的适配冲突等，对应科斯与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96）的组织边界与治理逻辑，主要存在于中观组织交易生态层面，是影响中观交易效

率的核心因素。

技术场域摩擦。既包括传统交易中交易媒介落后、交易时空阻隔等摩擦，也涵盖数字时代算法标准不统一、跨境数字技术规则割裂、数字交易安全缺失等新型摩擦，弥补传统交易理论忽视技术维度的重大缺陷，完美适配数字经济时代交易技术迭代带来的全新摩擦形态，增强理论的时代适配性。

（三）交易生态摩擦与交易成本的本质界分

交易生态摩擦并非对交易成本概念的简单更名或同义替换，二者在范畴边界、分析层次、内在属性、评判准则与适用场景上存在根本性差异，明确二者界分是本文理论创新的核心前提，也是避免理论混淆的关键。

从范畴覆盖边界来看，传统交易成本聚焦工业经济背景下实体商品流转与双边契约缔结过程，仅涵盖搜寻、谈判、缔约、履约等可货币化、可会计计量的显性耗费，局限于生产端向交易端过渡的流程性损耗。而交易生态摩擦立足四维嵌套生态体系，不仅内含传统交易成本这一子类别，还拓展至主体认知偏差、人际信任断裂、契约关系失衡、制度规则错配、组织边界壁垒、算法数据遮蔽、跨层级生态割裂等大量非货币化、非市场化、结构性的秩序阻滞，范畴覆盖广度与深度均远超交易成本。

从分析层级与研究视角来看，交易成本始终停留于微观个体与企业组织的局部单点分析，以单次交易与双边关系为基本单元，难以把握交易系统的整体性特征。交易生态摩擦则立足于系统生态视角，着眼微观、中观、宏观、数字全域的嵌套耦合关系，关注生态结构适配、层级协同运行与整体稳态演化，实现从单点交易耗费向系统结构摩擦的理论升维，更契合复杂交易现实的分析需求。

从价值评判与治理逻辑来看，传统交易成本理论隐含“成本愈低效率愈高”的单向评判准则，政策导向集中于简单削减制度性审批与交易费用，忽视了成本降低可能引发的秩序失范问题。交易生态摩擦则具有二重性，不存在绝对最

小化最优：过高的摩擦会阻滞分工与交易流转，过低的摩擦则会弱化契约约束与市场秩序。因此，必须区分无效冗余摩擦、良性适度摩擦与结构错配摩擦，采取分类治理、结构调适与生态重构的治理思路，突破传统降成本的单一政策逻辑，更具现实指导意义。

从时代适配场景来看，交易成本范式根植于线下实物交易与工业经济架构，难以解释平台垄断、算法缔约、数据要素交易、数字生态壁垒等新型现实问题，存在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交易生态摩擦天然兼容实体交易与数字交易双重形态，能够适配数字经济下算法匹配、网络外部性、生态型垄断等新特征，实现传统交易成本理论无法企及的时代解释力，适配数字经济发展需求。

综上，交易成本只是交易生态摩擦在实体单次交易场景下的局部子集与特殊形态，交易生态摩擦是对交易成本理论的范式拓展、系统升维与逻辑超越，二者不可等同视之，也不能相互替代。

（四）从成本最小化到生态摩擦动态稳态均衡

科斯范式的核心决策逻辑，始终坚守“单一交易成本最小化”的终极标准，无论是市场与企业的选择、制度安排的设计，还是契约模式的匹配，均以交易成本最小化为核心判定依据，这一逻辑难以适配复杂交易生态的运行规律。而交易生态范式则实现核心决策逻辑的升维：经济组织形态、制度规则供给、契约治理模式、平台架构设计的最优选择，不再拘泥于局部单一成本的最小化，而是以整个交易生态的摩擦收敛、稳态均衡、长期共生可持续为核心判定标准。

在现实经济中，局部交易成本的最优，往往可能引发全域生态摩擦的飙升与长期秩序失范，这一现实悖论是科斯单一成本范式无法合理解释的。例如，数字平台凭借算法与规模优势，实现自身交易成本的最小化，却也形成生态垄断、数据壁垒，损害全社会的交易公平与创新活力；部分行业依托行政寻租降低自身经营成本，却造成全域资源错配与制度摩擦的加剧，违背资源优化配置的基本逻辑。而交易生态摩擦的稳态均衡逻辑，能够完美推演、精准解读此类现实悖论，清晰揭示局部成本与全域生态的内在关联，彰显全新范式的理论超越性与现实解释力。

交易生态摩擦不存在绝对的最优零值，也不宜沿用传统范式的最小化逻辑，而是存在结构性适度阈值与稳态均衡区间。本范式的核心理论跃升在于，将传统单一维度的成本最小化准则，重构为全域交易生态的摩擦结构适配与稳态均衡准则：经济组织形态、制度规则供给、契约治理模式与数字平台架构的最优设计，不再追求局部单一摩擦的极致压低，而是以整个交易生态的结构耦合、摩擦适配、长期共生与动态稳态为核心判定依据。

生态稳态均衡的核心逻辑是：通过四维生态内部规则调适、主体行为规范、制度供给优化、数字标准协同，将各类生态摩擦调控在合理阈值区间，既避免高摩擦带来的交易阻滞与分工萎缩，又防止低摩擦引发的秩序失范与机会主义横行，最终实现交易生态的动态演化、结构适配与长期均衡，兼顾效率与公平。

（五）生态摩擦分类治理的政策范式

从政策逻辑与治理导向来看，生态摩擦的治理并非简单“一刀切”式压降，而应建立分类校准、结构优化的治理思路，形成区别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全新政策框架，兼顾治理的针对性与系统性。

其一，坚决破除无效冗余摩擦。针对行政人为设限、地方市场分割、行政性寻租壁垒、数据垄断封闭、算法不透明遮蔽等纯粹效率损耗型摩擦，通过简政放权、统一市场规则、强化反垄断监管、推进数据开放共享、规范算法合规应用等举措持续消解，畅通经济循环与交易流转，释放市场活力。

其二，合理维系良性适度摩擦。适度的产权界定成本、契约履约约束、行业资质准入、专业信息壁垒与声誉维系成本，是保障交易信任、规范市场行为、激励专业分工与创新活动的必要支撑，不宜盲目清零或过度弱化，需保留其秩序维系与分工激励的正向功能，实现效率与秩序的平衡。

其三，着力调适结构错配摩擦。针对传统制度与数字交易形态不适配、跨区域规则不兼容、跨境数字标准割裂、平台生态权责失衡等结构性失衡问题，不简单以升降摩擦为目标，而是通过制度重构、规则协同、技术赋能、治理体系升级，重塑生态要素配比与层级结构，推动错配摩擦向适配摩擦转化，实现交易生态的协同高效运行。

相较于科斯范式局部成本最优易引发全域生态失衡的理论悖论，交易生态摩擦稳态均衡框架，能够合理解释数字平台私人成本最小化却衍生社会生态垄断、算法歧视与公平受损等现实难题，实现从单点静态成本比较向系统动态生态均衡的范式升维，也为市场制度设计、平台生态治理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全新的底层理论依据与政策分析范式，彰显理论的实践价值。

五、交易生态的三层协同治理与闭环演化

基于交易生态的四维嵌套结构与六大摩擦类型，本文建构“自我治理—契约治理—制度治理”三层协同治理体系，同时归纳交易生态四阶段闭环演化路径，完整呈现交易生态的治理逻辑与演化规律，实现治理理论与演化理论的有机融合，为交易生态治理提供系统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一）三层协同治理机制

交易生态的三层协同治理体系，并非三个独立并行的治理模块，而是嵌入交易生态各层级、各要素，相互配合、协同发力、上下联动的完整治理闭环，核心目标是消解生态摩擦、维系生态稳态、防范秩序失范，保障交易生态系统有序高效运行。

第一层为主体自我治理。主要依托交易主体的声誉机制、人际信任互惠、行为自律约束与社会习俗规范实现自发调适，对应行为经济学的非正式约束逻辑，是微观个体交易生态最基础的治理方式。其核心作用的是通过重复博弈与长期声誉积累，抑制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主体禀赋摩擦与信息生态摩擦，维系微观交易秩序的稳定，为交易生态运行奠定微观基础。

第二层为多元契约治理。整合完全契约、不完全契约、关系契约、第三方履约担保等多重治理工具，根据不同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与不确定性的交易场景，匹配对应的契约治理模式，吸纳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85）治理结构理论与哈特等（Hart, 1995）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合理内核。其核心功能是化解契约结构摩擦与组织边界摩擦，规范中观组织之间、个体与组织之间的交易行为，保障交易履约效率，衔接微观自我治理与宏观制度治理。

第三层为顶层制度治理。通过产权制度明晰交易主体的权利边界，通过法治体系强化交易履约保障，通过信用体系降低信息生态摩擦，通过反垄断规制破除组织边界摩擦与垄断壁垒，通过公共规则统筹跨区域与跨境交易秩序，依托宏观制度供给规制中观与微观生态的运行边界。其核心作用是消解规则制度摩擦与全域系统性摩擦，为整个交易生态系统提供顶层规则保障，实现全域生态的稳态均衡，筑牢交易生态治理的制度底线。

三层治理机制深度耦合、上下联动，形成“个体自律—契约约束—制度兜底”的完整治理闭环：既适配微观个体交易生态的柔性治理需求，也满足中观组织交易生态的协同治理需求，更兼顾宏观制度交易生态与数字全域交易生态的刚性治理需求，实现不同层级、不同形态交易生态的全覆盖治理，破解传统单一治理模式的局限。

（二）四阶段闭环演化路径

综合哈耶克（Hayek, 1960）自发秩序理论与诺斯（North, 1981）制度变迁逻辑，依托交易生态的内在运行机理，本文原创归纳“原生自发生态—规则固化生态—摩擦失衡生态—制度技术重构生态”四阶段闭环演化路径，清晰刻画交易生态从生成、定型、失衡到重构的完整生命周期，实现演化理论与制度理论的深度融合与范式升级，弥补传统演化理论缺乏内在机理与治理导向的短板。

第一阶段为原生自发生态。由微观个体的零散交易自然萌发，主要依托熟人关系、习俗惯例与人际信任维系运行，无正式契约与成文规则，生态结构简单、交易规模有限、自组织特征突出。这一阶段的交易摩擦主要表现为轻微的主体禀赋摩擦与信息生态摩擦，交易秩序依靠非正式约束维系，是交易生态的初始生成阶段，凸显交易生态的自发性特质。

第二阶段为规则固化生态。随着交易规模扩张、交易主体增多、交易范围突破熟人圈层，交易过程中自发衍生行业惯例、书面契约、产权雏形与自律规则，交易生态结构趋于定型，中观组织与宏观制度的雏形逐步形成，交易生态进入稳态发展期。这一阶段的交易摩擦得到有效缓解，主体自我治理与多元契约治理开始发挥主导作用，交易效率稳步提升，交易生态逐步走向规范化。

第三阶段为摩擦失衡生态。随着交易主体实力分化、信息垄断加剧、机会主义行为泛滥，以及数字技术迭代冲击，各类摩擦集中爆发，出现平台垄断、寻租泛滥、契约违约频发、区域交易壁垒凸显等秩序失范现象，原有生态稳态被打破，交易生态进入失衡重构的窗口期。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各类摩擦相互交织、相互放大，单纯依靠微观与中观治理已无法化解矛盾，亟需顶层制度治理与技术赋能实现生态重构。

第四阶段为制度技术重构生态。通过完善产权法治体系、优化政府规制政策、健全社会信用体系、赋能数字交易技术、统一跨区域交易规则，从制度供给与技术赋能双向发力，重构交易生态的要素配比与层级结构，消解系统性生态摩擦，达成新的更高水平的稳态均衡，随后开启下一轮演化周期。这一阶段实现交易生态的迭代升级，是交易生态演化的核心阶段，也是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深度融合的集中体现。

这一四阶段闭环演化逻辑，既兼容演化经济学自发演化的合理思想，又弥补其缺乏内在机理与治理机制的缺陷；既吸纳诺斯制度变迁的核心逻辑，又将制度变迁还原为交易生态摩擦失衡后的内生重构结果，实现演化理论与制度理论的深度融合，为解读交易秩序的形成与变迁提供全新理论视角，也为交易生态治理提供了契合演化规律的实践指引。

六、新交易经济学的范式价值与学科拓展

（一）范式价值：解释边界与实践引领

以交易生态、生态摩擦、稳态均衡为核心的新交易经济学范式，突破了传统交易理论的固有边界，既能解释传统范式无法自洽回应的重大现实经济命题，又具备极强的现实落地价值，可为国家重大经济治理提供坚实理论指导与可操作的实践路径。

在解释边界上，新交易经济学实现了五大突破性弥补，精准回应传统理论

的解释盲区：其一，破解“私人成本最优但社会生态严重失衡”的悖论，明确个体局部成本最优并不等同于全域生态稳态最优，平台内部低摩擦往往会人为制造跨主体、跨行业的结构性高摩擦，这一系统解释是传统单一成本视角无法触及的；其二，阐释“持续降成本却市场乱象增多”的矛盾，借助生态摩擦二重性理论说明，适度良性摩擦是维系市场秩序的必要底座，盲目压降所有摩擦必然引发生态失序与市场乱象；其三，适配数字经济新型交易逻辑，将算法、数据、网络外部性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实现从工业时代交易逻辑向数字时代生态交易逻辑的范式跨越；其四，揭示区域市场分割的深层机理，从系统视角指出市场分割并非局部问题，而是交易生态多层结构耦合失衡的系统性结果，解释深度与理论穿透力远超传统理论；其五，厘清分工与交易约束的辩证关系，明确分工深化依赖合理的摩擦结构，良性规则摩擦能够保护创新、维系分工秩序，突破了传统理论“成本越低分工越细”的片面认知。

在实践路径上，新交易经济学立足中国经济治理现实，形成了五大明确且可落地的行动方向：其一，国家顶层治理层面，推动政策导向从“单一降成本”转向“生态摩擦结构治理”，分类清理无效摩擦、保留良性摩擦、调适错配摩擦，实现交易生态整体优化；其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层面，以交易生态四维协同破解区域市场分割，推动要素自由流动与交易规则统一，夯实市场一体化基础；其三，平台监管层面，以生态均衡为核心约束平台无边界扩张，规制算法黑箱、破除数据壁垒，防范平台垄断引发的生态失衡；其四，产业治理层面，优化产业组织边界摩擦，构建分工合理、生态共生、协同高效的产业交易生态，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其五，营商环境优化层面，推动优化导向由“费用减负”向“生态稳态优化”升级，建立以交易生态健康度为核心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提升市场运行效率与韧性。

（二）学科拓展：理论分支与学派建构

新交易经济学以“交易生态—生态摩擦—稳态均衡—分类治理”为核心底层逻辑，具备完整的公理体系、独立的理论范畴、清晰的结构框架与明确的应用边界，可沿着基础理论、应用分支、交叉学科三大方向持续拓展，逐步成长

为独立学科、自成学术流派，丰富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

在基础理论拓展上，可重点深耕四大方向，夯实理论根基：一是交易生态演化动力学，系统构建交易生态从低级到高级、从工业形态到数字形态的演化规律与迭代机理，揭示生态演化的核心驱动因素与路径特征；二是生态摩擦量化理论，建立涵盖六大摩擦维度的指标体系、测度模型与阈值测算方法，实现生态摩擦的可量化、可实证、可调控，破解传统理论难以量化的短板；三是交易生态稳态均衡理论，构建交易生态动态均衡模型，分析政策冲击、技术变革对生态均衡的影响机制与响应路径，为治理实践提供量化支撑；四是交易生态分工理论，重构分工与摩擦、秩序、生态结构的内在关联，弥补传统分工理论忽视生态约束的时代短板，完善分工理论体系。

在应用分支拓展上，可结合现实经济领域需求，衍生五大专属应用领域，强化理论落地性：一是数字交易经济学，聚焦数据要素、算法交易、平台生态等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交易形态，破解数字交易中的生态摩擦与治理难题；二是区域交易生态理论，重点研究城市群、省际市场分割与协同一体化的摩擦治理路径，助力区域协调发展；三是产业交易生态理论，关注产业链、产业集群的契约摩擦与共生演化机制，为产业生态建设提供理论指引；四是制度交易生态理论，重构制度变迁与生态摩擦的互动关系，阐释制度设计对交易生态的塑造作用；五是国际数字交易生态理论，聚焦跨境数字贸易规则构建与全球交易生态协同，回应全球数字贸易发展需求。

在交叉学科拓展上，可与制度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数字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复杂系统科学等学科深度融合，培育新的理论生长点：形成交易生态行为经济学，探究个体行为对交易生态的影响与反馈机制；构建交易生态复杂系统理论，运用复杂系统方法解析交易生态的非线性演化特征；发展交易生态与公共治理交叉方向，完善交易生态治理的公共政策体系，进一步丰富新交易经济学的理论谱系，提升理论的包容性与解释力。

七、结论与研究展望

本文立足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型的时代背景，直面传统交易理论碎片化、交易成本范式解释力不足的困境，原创建构“交易生态”核心元范畴，搭建四维嵌套结构体系，提出五大基础公理，构建生态摩擦理论、三层协同治理机制与四阶段闭环演化路径，形成了完整的新交易经济学理论体系。研究表明，交易生态范式实现了从交易成本到交易生态的范式革命，将传统交易成本内化为生态摩擦的子类别，打破了“摩擦最小化”的固化认知，兼容整合了八大主流学派的合理内核，能够破解传统理论无法解释的数字交易新现实。

新交易经济学的核心学术贡献，在于首创“交易生态”范式级元范畴，搭建了“本体公理—四维结构—生态摩擦—三层治理—闭环演化”五位一体的完整体系，实现了交易经济学从碎片化研究向系统性范式的历史性跨越，为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奠基性支撑，具备冲击国际学术前沿、斩获诺奖级影响力的理论潜质。在实践层面，该范式可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平台生态治理、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全球跨境交易秩序重构提供全新理论工具与实践路径。

后续研究可从三个方向深化拓展：一是开展数理建模与量化指标体系构建，将生态摩擦、稳态均衡水平等核心概念可测化、模型化，强化理论的严谨性与实证支撑；二是选取平台经济、跨境数字贸易等典型场景，开展案例分析与计量研究，验证范式的现实解释力，提炼可复制的实践经验；三是结合中国制度优势与数字经济实践，提炼具有本土特质的交易生态运行与治理模式，强化范式的原创性与全球引领性，实现从理论原创到范式引领、从本土建构到走向世界的跨越。

参考文献：

[1]Commons J R.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Vol. I: Its Place in Political Economy [M].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34.

[2]Coase,R.H.The Nature of the Firm[J].Economica,1937,4(16):386-405.

[3]Williamson O E.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Firms, markets, relational contracting[M]//Das Summa Summarum des Management: Die 25 wichtigsten Werke für Strategie, Führung und Veränderung. Wiesbaden: Gabler, 1985: 61-75.

[5]North,D.C.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M].New York:W.W.Norton,1981.

[6]Smith,A.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M]. London:W.Strahan and T.Cadell,1776.

[7]Buchanan,J.M.,Tullock,G.The Calculus of Consent: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M].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2.

[8]Hart,O.F.Firms,Contracts,and Financial Structure[M].Oxford:Clarendon Press, 1995.

[9]Grossman,S.J.,Hart,O.F.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A Theory of Vertical and Lateral Integratio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6,94(4):691-719.

[10]Simon,H.A.Administrative Behavior:A Study of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i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M].New York:Macmillan,1947.

[11]Walras L. Elements of pure economics: Or the theory of social wealth[M]. Routledge, 2013.

[12]Hayek F A.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13]Williamson,O.E.The Mechanisms of Governance[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14]王振营。交易经济学原理[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6.

[15]何全胜。主要经济流派关于交易经济学的研究综述[EB/OL].鼎新经济学会，2026-04-28.<https://mp.weixin.qq.com/s/4QlteQhxbKwsYiH8tWaTsQ>.

New transaction economics: Paradigm Revolution from transaction cost to transaction ecology

Zhao Huilin

(1. Shantou University, Shantou, Guangdong, 515063)

Abstract: since Adam Smith started the study of transaction theory, eight schools of classical economics, neoclassical economics, ol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have developed independently according to their respective contexts and achieved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s in local areas, but they have always fallen into the dilemma of fragmented perspectives and norms, and failed to form a core meta category and unifi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at governs the overall situation. Coase constructed a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with transaction cost as the core, and promoted the key transition of modern transaction theory. However, its single cost analysis dimension is difficult to cover the multi-level economic structure, and it is also unable to adapt to new transaction forms such as platform transactions, data elements, algorithm contract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economy. This paper originally proposed the core meta category of "transaction ecology", defined its ontological connotation and basic axioms, built a micro meso macro digital four-dimensional nested structure, built an ecological friction theory beyond transaction costs, a three-tie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a closed-loop evolution path, and demonstrated the theoretical originality and practical explanatory power through Paradigm Comparison. Research and realize the fundamental change of transaction economics from fragmented sub research to systematic paradigm, which is not only compatible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the reasonable core of Western schools, but also can break the new reality of digital trading that cannot be explained by traditional theories, and provide the foundation and original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dependent economic knowledge system, the design of market system, the ecological governance of pla

tform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global trading order.

Key words: transaction ecology; New transaction economics; Ecological friction;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Digital transaction